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

——答金冶同志

王辅一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史学界一直有争论。金冶所写《评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论述》(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片面引述材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因此,笔者仅就金冶的文章谈点看法,并客观地提供一些史料,供读者明晰。

第一,关于研究态度。

金冶文完全否定《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叙述,说指出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有失误,就是否定“抗日战争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性,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不断研究、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才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际上,毛泽东和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就是在领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运用前人和自身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从而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那种只讲成功而不许讲失误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金冶文引用的胡乔木的回忆录,并非是专门讲皖南事变历史过程的,而是着重讲毛泽东如何处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讲如何与国民党斗争、如何争取中间派的策略。胡乔木在回忆中,并未讲中国共产党内谁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败负责的问题,既未讲毛泽东没有责任,也未讲全部责任由项英负责。胡乔木

还讲道：“皖南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处理得好些，不至于有那样大的损失。”^①他讲得很含蓄，仔细体味一下，就会觉察到不一定就是讲项英。胡乔木说：“中央在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②这里面并未说它是完全正确。这些都是值得很好体会的。而金冶文却将对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皖南事变一个事件处理的看法说成是对整个抗战中期中共中央工作的评价，把《项英传》中有关皖南事变的叙述说成是和胡乔木的回忆录相对立，这种作法是不可取的。

顺便说一下，徐君华文关于项英反对东进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对所谓项英反对“江抗”东进，这些年有人讲得神乎其神，可就是拿不出第一手的文电为凭。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这类电报是不会不保存下来的。而史学界如此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出所谓项英反对“江抗”东进的电报，找出的却是项英1939年10月26日向中共中央报告已经东进的“江抗”不该西返的电报。这个电报讲道：“江抗”西返，是由于他们“无信心及不了解坚持东路的意义所致。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项英指出：“但事已如此，不能冲回东部”；我们已派何克希、赵伯华等东返主持。他在报告中还讲道：对顽固派的破坏进攻，要“依自己方针，给予必要反击，不能斗争，不给反复者以打击，就难生存，也不易发展”。^③项英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他对向东作战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要进行斗争的态度，读者会一目了然。

第二，关于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对皖南形势和整个华中形势，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正确的指示。然而1940年皖南事变前夕，即当年夏秋之际，当英、美、苏为了各自的利益加紧援华，使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

③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二），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1964年印，第159页；《项英传》第355页。

国共关系骤然恶化之初,毛泽东没有把握住形势的全貌,过高估计中苏关系对解决国共危机的作用,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消极影响,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在皖南事变前,毛泽东对蒋介石集团反共策略的认识有很大的变化过程。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国共关系紧张时,毛泽东倾向于在军事上采取进攻的策略来对付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11月3日,毛泽东等在致彭德怀电中,称:“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以此来“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①因事关重大,毛泽东向共产国际请示。11月4日,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说明采取重大行动的必要性,称:“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反共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但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②

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并无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亲日派正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③斯大林明确认为,中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④

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重新考虑并改变了自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

② 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3页。

③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4页。

④ 同上书,第123—124页。

己的形势估计和军事对策。11月6日,毛泽东致李克农、项英、董必武并告周恩来电中,要求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表示“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日与团结”的态度,来从政治上谋求缓和。^①11月21日,毛泽东关于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在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电中,指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调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当然进攻张云逸、彭雪枫是可能的)。”^②11月30日,毛泽东等电告叶(挺)、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③

特别是蒋介石12月9日发出限新四军于当年12月31日前全部开过长江以北的手令后,毛泽东对时局的危险性仍估计不足。12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叶、项:“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④12月16日,毛泽东等关于目前时局致胡(服)陈(毅)并告叶项电中,仍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⑤12月19日,毛泽东等就日汪条约签订后的形势,在致彭(德怀)左(权)、叶项等电中,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⑥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中,仍认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05页。

④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9页。

⑤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6页。

⑥ 同上。

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①

情况的发展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相反,在那以后只十多天,蒋介石确未投降日本,但却发动了皖南事变。请读者考虑,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分析究竟有没有值得研究之处?有没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三,关于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有没有让“拖”?

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蒋介石集团开始先在《皓电》中限一个月內开到江北,后又限令于1940年12月底北移完。由于毛泽东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谈判讨价还价的砝码,对北移时限的考虑就有了一个变化过程。

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何应钦、白崇禧电(即《佳电》)中,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②,但是没有答应具体移动时间。

此时,由于国民党方面调集汤恩伯、李品仙大军东进,苏北、皖北地区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发生了以撤出皖南的让步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交换条件的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关于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在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项英电中,称:“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③这就需要皖南新四军在作北移准备的同时,维持着“拖”的局面。

在这以后,中共中央、毛泽东虽曾多次电告叶挺、项英,要他们认真准备北移,也曾要他们于12月底移完,但仍要他们“拖”,这也是有文电为凭的。11月21日,中共中央致叶、项电中,称:“你们可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7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③ 同上书,第100页。

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① 据此理解,可拖到 1941 年 1 月中旬。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移动时间蒋限 12 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② 就是说,可以展限到 1941 年 1 月底。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国民党谈判代表刘为章电中,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 2 月半,在 2 月 15 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③ 直到 12 月 25 日,毛泽东仍表示:“以拖为宜,拖到 1 月底再说。”^④

12 月 26 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他 25 日会见蒋介石,向蒋提出经毛泽东 24 日同意的与蒋谈判时皖南部队北移的条件(即:速给新四军发补充;停止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蒋根本不让步。周认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⑤ 这表明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谈判砝码的价值已不复存在,“拖”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毛泽东这才下决心叫快走的。恰在这时,叶、项于 25 日致电毛泽东,请示行动方针。于是,毛泽东在 26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严厉批评他们“犹豫动摇”,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⑥

上述事实,请读者判断: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让“拖”?这种“拖”的态度对赢得北移的有利时机会不会有影响?所谓“拖”的问题能不能都怪项英他们呢?

第四,关于如何看待《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1941 年 1 月 15 日,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情况未及深入调查就发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完全否定了项英、袁国平在新四军三年多的工作成绩,将新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103 页。

② 同上书,第 109 页。

③ 同上书,第 111 页。

④ 同上书,第 116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0 页。

⑥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120 页。

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归于项英、袁国平，并将项英、袁国平和叛徒张国焘并列起来。^①《决定》下达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对项英、袁国平评价由原来很高变得很低，反差极大。但《决定》有些话并未说死：一是，“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②二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③由于中共“七大”至“十四大”的历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均未讨论有关项、袁错误的问题，因而《决定》就被搁置起来，成为党史学界长期争议的一个焦点。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座谈会上，讲道：“有些历史问题，中央还未作最后结论，其中包括对皖南事变及对项英同志的看法。”“项英同志总还是一个革命家吧，总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是个烈士。他牺牲在敌人（叛徒）屠刀之下的，否则怎么会埋葬在雨花台呢？”^④

198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室负责人、研究员王秀鑫在《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的文章中，用大量事实肯定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贡献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同时指出《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项英“指责过分”，“上纲过高”，“不够实事求是”。^⑤

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在谈到项英及《决定》时，讲道：“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认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66—268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同上书，第268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1期，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第7页。

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学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①

一些皖南事变的亲历者,也对《决定》提出不同看法,要求公正评价项英、袁国平的功过,在这里不一一叙述。对《决定》究竟应如何看待才好?请读者考虑。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荣维木)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8页。